

從東亞文化研究談臺灣的主體性⁺

林月惠^{*}



筆者在此論壇中所要探問的是：在東亞文化交涉研究中，臺灣的中華民國佔有何種獨特的位置？這就牽涉到，臺灣的人文社會研究者為何要研究「東亞」？有何新視野？臺灣獨特的東亞文化研究位置在哪裡？¹

先從幾個實例說起。今年 10 月，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舉辦「臺灣漢學研究新世紀」學術論壇，韓國白永瑞教授發表〈對話互動之相映——全球本土角度下臺灣與韓國之漢學研究〉一文，以「對於我們來說，中國意味著什麼？」提問，討論韓國漢學研究的歷史軌跡，並藉由與臺灣漢學研究的比較，探討兩國漢學研究的特點，最後以「對於中國，我們意味著什麼？」的反思提問，展望兩國漢學研究未來發展的方向，指出全球本土視角下漢學研

究的新契機。白教授在探討漢學（或「中國研究」）時，不斷反思，作為研究主體的韓國或臺灣，發言與批判的位置在哪裡？甚至尖銳地提問，對臺灣而言，漢學研究（中國研究）是否視之為「外國研究」？此論一出，不少臺灣人文學界的學者，大多持保留的態度。筆者評論時，指出白教授將漢學研究（中國研究）的客體（對象），只對應於現實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而無視於也同樣作為獨立的政治實體，而且是「現在進行式」的中華民國之存在。這是中國大陸崛起之後，壟斷「中國」一詞後的誤導。其結果，國外學者就忽略臺灣學界自 1949 年以後，對於漢學研究所作出的貢獻，以及臺灣漢學研究的特殊性。

另一個例子是，筆者曾經向來自歐洲拉脫

⁺ 本文係 2011 年 12 月 23 日本院與國家發展研究所合辦之「國家發展論壇」《文化與文明系列》第一場研討會內容。原刊登於本院院訊第 23 期（二〇一二·夏），因有錯漏而重刊，以確保本文之完整性。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¹ 本文的內容與觀點，部分出自拙文〈東亞文化視野下的臺灣與韓國之漢學研究〉，乃「漢學研究中心三十週年學術論壇——臺灣漢學新世紀」（2011 年 10 月 14-15 日）的特約討論稿。

維亞與斯洛維尼亞的漢學系教授提問：為何來臺灣進行當代新儒學（Contemporary New-Confucianism）研究？前者的回答是：在研究現代中國哲學思想時，發現只有當代新儒學致力於與西方哲學文化的對話、會通。後者的回答是：作為一個漢學家，不僅要理解傳統的中國（文化中國），也要理解現實的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了理解目前中國大陸何以重視現代新儒學思潮與國學熱（含讀經運動）等現象，追本溯源，有必要研究臺灣的當代新儒學思想。兩位歐洲漢學家針對具體研究課題，顯示紮根並茁壯於臺灣的當代新儒學思想並非狹義中國民族主義思想的代表，而是經由中西哲學互動所產生的思潮，此思潮所具有的開放性，及其對中國大陸的影響，頗能顯示臺灣作為漢學研究的主體，有其獨特的位置與視角，在華人學術界中有無可取代的地位。

最近幾年來，臺灣學界的文、史、哲等人文學科，不約而同地意識到東亞文化視野的重要性。如研究臺灣史的許雪姬教授就說：「以東亞的詮釋框架來思索研究路徑，〔……〕可以展開國際對話的主題，如何培養、訓練年輕的研究生具有更充實的研究能力更是刻不容緩的事。」²而陳芳明教授也強調作為主體性的臺灣文學研究，一定要具備東亞的視野。³而在哲學思想界，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與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⁴也不斷推動有關東亞儒學（或東亞哲學）的研究。換言之，臺灣學界已經逐漸意識到「東亞文化」視野，對人文學科（乃至社會科學）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臺灣人文學界所謂「東亞」，不是一個「地緣政治學」的概念（如「大東亞

共榮圈」），也不是以中國文化為本位而將東亞實體化，而是人文地理學的概念，意味著「文化東亞」，⁵它擺脫「文化一元論」的中心意識，同時預設「文化多元性」的立場。它承認東亞各國文化的主體性與差異性，也彰顯「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開放性。⁶在這個意義下，所謂「東亞」研究，不能僅止於戰略或政經上的區域性研究，它必得縱深到東亞文化歷史脈絡與價值理念中。

事實上，隨著國際局勢與海峽兩岸各種情勢的變化，臺灣人文學研究因特殊的文化歷史條件，已經由單一的「文化民族主義」的立場，逐漸轉向「多元文化」的開放性發展。因此，人文學界強調「東亞文化」的學術自覺，既來自於學術社群的成熟，也來自於臺灣獨特的歷史文化處境與民主化的努力。無可諱言，迄今為止，中國大陸學界較為缺乏東亞的橫向思考，⁷東亞（亞洲）的討論大多處於問題的邊緣，而非中心。甚至，有不少中國大陸學者，仍抱持中國國族中心的心態，來看待東亞的文化與文明，將東亞文化視之為中國文化的延伸，他們關切的仍是與西方文化的抗衡。例如，目前中國大陸雖然提倡「國學熱」，並重視傳統儒學，但除了政治穩定的策略性考量外，背後凸顯的是與西方文化對抗下的單一的、純粹的民族文化認同，並與敏感的政治認同糾結在一起。其結果必然成為封閉的、排他性的學術傾向。相對地，從臺灣特殊的文化歷史處境來看，臺灣既是傳統中國文化現代化較為成功的實踐（實驗）場域，也曾歷經殖民統治的經驗，以及中西文化的衝擊。正由於臺灣已經走過文化民族主義的階段，也揚棄以中國

2 許雪姬：〈臺灣史研究三部曲〉，《思想》16期（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0年10月），頁99。

3 參陳芳明：《陳芳明文集9 楓香夜讀》（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9年），頁355-391。

4 參李明輝：〈中央研究院「當代儒學主題研究計畫」概述〉，《漢學研究通訊》，總76期（2000年11月），頁567。

5 參吳震：〈試說「東亞儒學」何以必要〉，《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15期（2011年6月），頁310-313。

6 參黃俊傑：《東亞儒學：經典與詮釋的辯證》（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8年），頁43-44。

7 參白永瑞：《思想東亞：韓半島視角的歷史與實踐》（臺北：臺灣社會研究雜誌社，2009年），頁94-112。

文化為中心的意識，故較能以多元文化的角度，藉由跨文化的研究，正視東亞各國文化的主體性與獨特性，以及文化交涉過程中所呈現的「動態流變」與「混雜現象」。就此而言，臺灣不僅有複雜多元的文化經驗，也在與現實中國（大陸）、東亞文化、歐美世界交錯的張力中，展現其深刻的歷史感。顯然地，臺灣作為研究主體，它同時具備中國的（文化中國與現實中國）、東亞的、世界的三種發言位置，「混雜性」、「多元性」與「開放性」是其特徵，既有「全球化」的視野，也呈現「在地化」的特色。由於這樣的特徵，在東亞文化研究中，強調「臺灣的視角」或「臺灣的主體性」，並不會陷入國族中心的危險性與封閉性。

再者，在東亞文化研究中，中國大陸的崛起，是一個無法避免的「他者」；而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依舊是重要的議題。就前者而言，對中國大陸的研究，無法與臺灣的中華民國全然切割；反之亦然，如同前述所舉的例子一樣。就此而言，臺灣在東亞文化研究中，相對於韓國與日本，有其獨特的發言位置。因為，不論從儒學的教養、民族國家的建立，或是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殖民地的歷史經驗，乃至現代化與民主的實踐、後現代的衝擊等，臺灣與東亞各國都有類似的歷史記憶與經驗。故臺灣相對於中國大陸，不僅較能持平地看待東亞文化研究中各國的主體性，而不會陷入「中心」／「邊緣」的二元對立與偏見。而且，就「文化中國」或中華民國而言，臺灣在「中國」之內；而針對現實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言，臺灣在「中國」（中國大陸）之外。就這個意義來說，臺灣是「流動的」主體，它可以隨時轉換它的發言位置，也可以自由地「進」（內）、「出」（外）「文化中國」、「現實中國」而展現其批判性與創造力。

若從東亞各國所面對的「傳統」到「現

代」的轉型議題來說，近年來臺灣的人文學界也意識到，以往的研究，多著重中西文化的比較，而忽略東亞文化內部的共同性與差異性。換言之，只顧及「遠親」（西方歐美國文化）而忽略「近鄰」（東亞文化）。儘管臺灣學界數十年來面對「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的糾纏、干擾，有其困境。但人文學界在對多重殖民經驗的歷史反思中，也逐漸意識到在「現代化」的轉型中，人文學與社會科學反而被西方文化「殖民」（淪為西方文化學術的殖民地，失去學術主體性）的危機。值此之際，我們的學術社群，有必要，也應有足夠的自信，以平和的態度與批判的精神，將所吸收的西方學術文化，有所簡別地回饋到東亞的文化研究中，為「傳統」到「現代」的轉型，提出批判性的反省與創造性的嘗試。尤其，在黃俊傑教授此次主題演講中所提到的東亞文化研究新視野（1）從東亞出發、（2）以經典及其價值理念為研究核心、（3）以文化為研究之脈絡來看，臺灣人文學界數十年來的積累，都佔有相對的優勢。如果我們能將研究心態與研究視野轉向東亞，關注東亞，厚植研究實力，讓區域性的東亞研究，縱深到東亞共有的經典與各自獨立的歷史文化脈絡中。在這樣的東亞文化視野下，人文學與社會科學的學術社群互補合作，學習東亞各國之長，補己之短。相信如此的努力，一定能對東亞文化研究，開創新局面；也能對國家未來的發展，提出新願景。

